



# 炎帝文化研究

第十一辑

●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 黄帝陵基金会 ● 炎帝陵基金会 主办

主编 赵德润

书  
大  
名

社



# 炎黄文化研究

第十一辑

•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 黄帝陵基金会 • 炎帝陵基金会 主办

主编 赵德润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炎黄文化研究. 第十一辑/赵德润主编.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 - 7 - 5347 - 5996 - 3

I. ①炎… II. ①赵… III. ①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8126 号

**责任编辑** 吴韶明

**责任校对** 李志远 杨德华

**装帧设计** 王翠云 美 霖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开元路 9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 -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 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http://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38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 - 351

## 编辑委员会

顾问 张岂之 方克立 石兴邦 韩 伟 文选德

主任 张文彬 孙天义 石玉珍

副主任 赵德润 强文祥 邓德芳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震中 邓玲玲 刘宝才 肖云儒 何炳武 张 翀

邵小强 周雪辉 郑万耕 耿相新 曹敬庄 梁 枢

主编 赵德润

副主编 王震中 邵小强 周雪辉

编辑部主任 张 翀

# 目 录

## 专 论

- 让中华民族的盛大节日更加丰富多彩 ..... 马 凯\1  
 “五经”的意义与重译的空间  
 ——在“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上的致辞 ..... 袁行霈\4

## 炎黄二帝及其时代

- 谈炎黄研究与二重证据法 ..... 鲁 淳\9  
 从连山看炎帝的起源 ..... 王震中\17  
 神农“连山”名义推索 ..... 王子今\21  
 黄帝文化与中原 ..... 李玉洁\30

## 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

- 建设中华节日体系 ..... 李汉秋\40  
 论清初赫舍里氏及其文化现象 ..... 滕绍箴 袁闾琨\50  
 “武夷”考 ..... 朱平安\66

## 思潮与学派

- 儒家仁学的实践意义 ..... 蒙培元\74  
 “仁爱”思想及其在当代的意义 ..... 吴根友\82

## 祭祀文化

- 论宋代“杀人祭鬼”与密宗尸身法术  
 ——兼与刘黎明先生商榷 ..... 王 瑜\98  
 “九鼎”传说流考及其中国传统文化 ..... 张 翀\111

## 文化丛谈

- 《周易》的“太和”理想及其价值 ..... 郑万耕\118  
 略论中国古代慈善文化的特点 ..... 胡发贵\124  
 北宋中期的阵法与阵图及其武学思想 ..... 周 荣 王路平\131

## 文物与考古

- 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图腾与炎帝彤鱼氏  
——兼论炎帝名号来由 ..... 曹定云\148
- 陕北北部一带史前文化遗存的系统梳理与研究 ..... 吕 静\157

## 文献整理与研究

- 《周易本义》(点校本)前言 ..... 廖名春\162
- 出土楚简与炎黄时代研究 ..... 刘彬徽\170
- 浅论王弼黄门侍郎之憾 ..... 蒋丽梅\175

## 中外文化交流

- 求知与漠视的变奏  
——晚明中国人的欧洲认识及西学观 ..... 钱婉约\186

## 探索与争鸣

- 老子的思想对治国理政的参考 ..... 王 蒙\199
- 先秦时期的“义利”之辨  
——透析传统社会心理与古代法之关系 ..... 明 辉\202

## 中华学人

- 先师孔德成 ..... 丁原基讲述 杜泽逊采访 何灿整理\208

## 书评与序跋

- 《长安学丛书》序 ..... 傅璇琮\224
- 一部启人心扉的口述史  
——读《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 ..... 李尚英\228
- 研究路数与理念的升华  
——读邢福义《语法问题献疑集》 ..... 汪国胜\233

## 学术动态

- “后新儒学”与中国哲学之未来:关于中国哲学研究方向  
与方法的一些省察 ..... 林安梧\237
- 民国时期的中国经学史研究 ..... 林庆彰\250
- “如保赤子”  
——儒家传统中的伦理与政治 ..... 伍晓明\261

# 让中华民族的盛大节日更加丰富多彩<sup>\*</sup>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 马 凯

己丑牛年即将过去,庚寅虎年正向我们走来。在此辞旧迎新之际,国务院参事室、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央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春节文化论坛,研讨如何把中华民族这一盛大节日办得更加丰富多彩,这件事很有意义。我代表国务院对论坛的举办表示衷心的祝贺!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在孕育博大精深的中华历史文化的同时,也孕育出多姿多彩的民族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腊八节等。其中,春节是喜庆时间最长、活动内容最多、节日气氛最浓、影响范围最大、全国各族人民最为重视的盛大传统节日。

春节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先民们在春耕、夏作、秋收、冬藏的劳动之后,在新的一年里春天到来之前,庆祝丰收、祭祀先祖、祈福未来、除旧布新。这一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喜庆节日,经过几千年的演变,所形成的一整套民俗文化和民众活动,蕴涵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审美情趣,已经成为展现、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窗口,成为表达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的重要载体,成为炎黄子孙永远不能忘怀的鲜明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记忆。因为这一时刻,民族认同得以集中体现。春节像一条割不断的精神纽带,把炎黄子孙的历史与现实、思念与期盼紧紧连在一起,人们油然而生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无论游子走得多远,春节都要回乡团聚;再穷的人家过年也要吃顿饺子,一家人除夕守岁其乐融融;海外华侨无论离祖国多远,也无论移民几代,对传统节日春节依然一往情深。因为这一时刻,民族文化得以集中展示。人们通过放鞭炮、写春联、贴年画、挂福字、吃年夜饭、串门子、逛庙会、唱大戏等一系列活动,除尘沐浴、辞旧迎新、敬天祭祖、尊老爱幼、团圆祝福,都是“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和为贵”等民族伦理和精神的反映。因为这一时刻,民族情感得以集中迸发。“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期间,到处洋溢着浓郁的乡情、亲情、友情,这正是爱国主义情结的重要基础。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宏伟目标;2005年4

---

\* 本文为2010年1月8日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同志在国务院参事室、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央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的春节文化论坛上的讲话。

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随后把春节等传统节日列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2005年6月,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强调突出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充分展现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执政为民是人民政府的根本宗旨,改善民生是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责。民生,既包括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也包括他们的精神生活。我们要把办好春节和其他传统节日,作为改善民生、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一件大事来抓。近些年来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如春节联欢晚会已经成为全世界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每年大年三十晚上,海内外数亿观众都会守在电视机前,观看长达四个半小时的节目,迎接新的一年到来。围绕春节的各种文化活动,如中央和国家机关14部委组织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等也很受百姓青睐。

但从总体上看,春节期间的文化活动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当下不少人明显感到春节的“年味”淡了,不像以前那样吸引人了;随着圣诞节、情人节之热,一些有识之士产生了某些担忧。如何增加春节文化含量,并与现代生活接轨,从而满足人民基本实现小康以后新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各级政府和文化艺术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春节文化论坛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要求,可谓恰逢其时。源于农耕文明的传统节日春节,怎样在现代文明中焕发新的光彩?

我认为,首先要深入发掘、保护和传承春节优秀文化内涵。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之中。”传承数千年的春节习俗,如除尘、祭祖、守岁、拜年、贴春联、放鞭炮、舞龙舞狮等,文化内涵是什么?许多人未必都能说得清,而专家娓娓道来就可以诠释文化的力量,增加知识性和趣味性。从春节的礼仪性、理想性到时代性、民族性、传承性,都需要发掘整理。

其次,要不断丰富和创新春节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古老的传统节日要融入时代的新内涵,满足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善用现代化的新手段。比如拜年形式就在不断发展,过去磕头、作揖,后来投帖、寄贺卡,现在发短信和电子邮件,传统文化融入了现代技术和传播手段,很受大众欢迎。据报道,去年春节期间,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六,全国发送的拜年短信超过180亿条,其中不乏精彩的诗词和“段子”,这种“拜年短信”的文学现象,就值得我们重视,应当运用好、引导好。古人咏春节的诗歌很多,贴对联更为普遍。如何利用好古典诗词和对联的艺术形式,融入时代的内容,也大有文章可做。春晚已经成为当今春节文化的重要平台,人们的艺术要求越来越高,也有个不断创新和提高水平的问题。

第三,要积极促进弘扬传统节日文化与扩大消费、发展文化产业相结合。春节期间,人群、金融、物资、信息、艺术的大规模流动,带动了文化、商业、交通、旅

游、电信、金融、餐饮各行各业全面繁荣,形成特有的“春节经济”。近两年春节经济“东方西渐”,许多外国商家也打起了中国春节牌。一些商家为体验中国文化来中国过春节,伦敦、纽约等城市在市中心举行春节游行庆祝中国农历新年。如何善于利用“春节经济”,既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又拉动经济增长,也是一篇大文章。

第四,要有效发挥政府和民间两个积极性。春节,涉及十几亿人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政府有责任花大力气起好主导作用,同时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鼓励和引导艺术家、民间团体和个人发掘整理旧民俗,创造和完善新民俗。政府与民间结合,对提高春节文化活动水平,增强趣味性、参与性意义很大。

第五,要认真研究借鉴世界各国特别是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节日文化的精华。我们应有宽阔的胸怀和博采众长的气度,丰富和创新我们优秀的节日文化;同时,也要理直气壮地反对以外来文化取代和否定我们的本土文化及其文化传统。

北京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老北京民俗里保存着许多春节文化的因子,北京市政府参加主办这次论坛很有意义。希望北京市在挖掘整理、弘扬丰富春节文化上带好头。让传承数千年的春节文化在首都地区首先热起来,火起来,靓起来。

## “五经”的意义与重译的空间\*

——在“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上的致辞

◇袁行霈

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孔子已有“六艺”之说<sup>①</sup>,指的是包括“五经”在内的六部经典。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春,汉武帝将“五经”立于学官,置五经博士,从此确立了《诗》、《书》、《礼》、《易》、《春秋》的经典地位。

“经”的意思是什么呢?《白虎通·五经》云:“经,常也。”<sup>②</sup>《释名》云:“经者,径也,常典也。”<sup>③</sup>可见,“经”是具有恒常意义的典籍。那么,“五经”的恒常意义究竟何在呢?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的几百年间,是中华文明极其灿烂的时代,也即西方学者所谓“核心时代”,其多姿多彩的精神成果很大一部分体现在“五经”之中。“五经”是中国本土原生的、属于中国文化源头的典籍。“五经”体现了中国古代对宇宙、人生、社会、历史、现实等各个方面的智慧,逐渐成为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因素,并维系着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其在维护社会和谐方面的价值,尊崇“仁”、“义”、“礼”、“智”、“信”和“德治”的意义,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哲学思想,都值得我们从今天学术发展所达到的高度,结合现实深入研究。

我对经学的研究十分浅薄,在这里只能讲一点自己的体会,向诸位请教。我认为“五经”在教人如何做人方面,具有重要的普遍的意义。《礼记·经解篇》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

---

\* 2009年7月27日,由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总部主办的“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香山饭店开幕。按照学术委员会的计划,将用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印地语和马来语9种语言翻译“五经”。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的30多位知名学者,在会议期间商讨了与项目有关的翻译体例、底本、出版等问题。本文是作者在会议上的致辞。

① 《史记·滑稽列传》,第3197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② 陈立:《白虎通疏证》,第447页,中华书局,1994年。

③ 毕沅:《释名疏证》,广雅书局丛书本。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sup>①</sup>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都是关于如何做人的问题。而《春秋繁露·玉杯》更特别针对在位者云：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贍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sup>②</sup>

中国人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一个完整的过程，首先要学会修身，进而学会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出发点与核心乃在个人的修养，也就是君子人格的培养，“五经”的核心就在于此。这是中国独特的政治智慧，也是“五经”作为经典，能够穿越时空恒久地发挥其作用的地方。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信仰缺失、道德下滑，人类肆意毁坏自然，生物的多样性日渐丧失，文化的多样性也面临威胁的当今世界，中国必须自警并馈赠给人类的，这种“人格意识”乃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中华文明有两点值得格外注意。第一，中华文明是唯一从未中断过的古老文明。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13亿人就是那创造古老文明的先民之后裔，在这片土地上是同一种文明按照自身的逻辑演进、发展，并一直延续下来。同时，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显示了巨大的凝聚力，不仅没有中断，也没有分裂；只有新的文明因素增加进来，而没有什么文明的因素分离出去成为另一种独立的文明。第二，中华文明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涉及哲学、史学、考古、宗教、政治、文学、艺术、科技、工艺、民俗等众多方面的，“文明总量”极其巨大的文明形态。直到现在，世界对中华文明的认识还很不全面，甚至连中国人自己对自己文明的认识还有不少片面和肤浅之处。而“五经”作为中国长期以来起过重要作用的典籍，便是一把钥匙，可以帮助世界从一个重要的角度认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奥妙，并为今后人类文明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资源。

翻译中国经典是西方汉学界的学术传统，例如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都取得了当时最高的成就。但以学术发展的眼光看来，仍有不少改进的空间。荷兰汉学家施舟人教授在中国国家汉办立项，充分利用当前的学术条件，邀请各国汉学家参与，在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翻译“五经”，是很有必要的。我希望，今天，2009年7月27日，成为汉学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香山这座不高的山因为这次

① 《十三经注疏》，第1609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②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35—36页，中华书局，1992年。

会议的召开,而成为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一个坐标。

翻译“五经”有三方面需要注意:

首先是底本的选择。底本的选择得当与否,对翻译的水平有很大的影响。近年来,古籍善本的普查和影印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以前的翻译者看不到的许多善本,我们可以方便地找来作为底本,从而使翻译工作有了超越前人的基础。此外,自20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出土了大量的文献和文物,又为“五经”的整理研究开拓了新的局面。例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出土的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都向我们提供了大批极为宝贵的新数据。充分利用这些新发现的资料加以参校,可以提高工作的水平。

例如《诗经》的版本,《毛诗》和朱熹《诗集传》不同,如果选用《毛诗》做底本,则必须连同《诗序》一起翻译;如果选用《诗集传》做底本,则朱熹已经把《诗序》删去了。这不仅是底本选择的问题,还涉及对《诗经》的整体把握。我们既然承认《诗》是“经”,必然要对汉代《诗经》学尤其是毛郑之学予以充分的重视,尽管其中有许多按照儒家政治教化的需要而加以穿凿附会之处,但汉儒的解说在历史上产生了长久而重要的影响,我们应当承认这个传统。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自宋代以来对《诗经》的解释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一些学者不再拘守甚至猛烈抨击汉儒的解释,转而从文学的角度加以解释,欧阳修的《诗本义》、朱熹的《诗集传》、郑樵的《诗辨妄》堪称代表。宋儒的视角和成就为我们注释《诗经》提供了新的角度,对于这个传统我们同样应当继承。如何在这两大传统中找到平衡,是翻译《诗经》的一个难点。

《毛诗》的版本很多,在我看来以宋刊二十卷本《毛诗诂训传》为最佳,其原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四部丛刊影印《毛诗》即用此本,现归中国国家图书馆。毛公诗学源于子夏,其书之章句训诂,多取自先秦典籍,其体例颇见条理。阮元《校勘记》引述《毛诗》版本,计有唐石经本、蜀石经本、宋小字本、相台本、明监本、闽本、毛本、考文本等数种,而并未以此本为校本,阮元或未得见。现在《中华再造善本》有影印本,很容易得到。翻译《诗经》,我们还可以利用敦煌文献中保存的《诗经》白文、传笺、正义以及音注,利用1977年8月在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中发掘出的《诗经》残卷,做出新的成就。

其次是对内容的诠释。中国和国外的学者对“五经”的解说汗牛充栋,我们应当广泛参考吸收;同时又要站在今天的高度,提出我们自己的见解。如能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以全人类的文化为参照系,吸取当代新的研究成果,就有希望解决一些过去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翻译过程中,有许多疑点和难点是无法回避的。例如《诗经·关雎》究竟是颂美“后妃之德”,还是如《鲁诗》、《韩诗》所说是刺康王晏起,抑或是一首民间的情歌呢?“君子好逑”这一句中的“君子”,究竟是与“野人”对举,指统治者

与贵族男子(如《孟子·滕文公上》:“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sup>①</sup>),还是泛指才德出众之男子呢(《易·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sup>②</sup>)?这些都是不能含糊的。

第三是翻译的准确和译文风格与原诗的统一。严复曾经提出信、达、雅这三条翻译的标准(见《天演论·译例言》),要想做到信、达、雅,实在很难。两套话语体系之间,常常找不到对应的词语和表达方式,这背后还有思维方式的差异。“五经”各有各的难处,《诗》难在如何找到合适的诗歌形式,包括押韵、句式等;还表现在如何传达其多义性。《书》难在语言的佶屈聱牙。《礼》难在典章制度难以找到对应的词语。《易》难在其联想性和暗喻性如何传达。《春秋》难在如何把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交代清楚。

姑且以《诗经》为例,“窈窕淑女”这一句,“窈窕”,《毛传》:幽闲。“淑”,《毛传》:善。“窈窕淑女”所描绘的乃是一个体现了典型的中国传统审美情趣的女性形象:娴静、美丽、善良、含蓄。但是,在英译本中,这种形象很难表现,有的译作“a lass with nice and pretty look”,仅仅突出了“淑女”的外形美,对于其内心之美没有表现出来;理雅各则将其译作“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用了四个形容词,在各种译本中是最接近原文的,但又略嫌繁复,像是注解,失去了诗意。又如,“君子好逑”中的“君子”,有的译者理解为“王”或“王子”(our lord; our prince),所以就将“琴瑟友之”当成了臣民对王后的欢迎仪式,而隐藏的主语也从“君子”变成了“我们”(we)。

《诗经》经常采用复沓的表现方式,如《关雎》篇“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这三句只换了一个字:“流”、“采”、“芼”。这三个不同的字在三章中表现递进的意思:先是“求”,然后是“摘”,最后是“择”,妙趣横生。但是,在英译本中,这种递进关系如何表现,值得认真琢磨。英国翻译家韦利(Arthur David Waley, 1889—1966)在他的译本中将“流”、“采”、“芼”分别译为“seek”、“gather”和“choose”,应该说,前两者的翻译基本切合,但以“choose”译“芼”则不妥。《毛传》虽释“芼”为“择”,但是这个“择”与“choose”却并非同义,《毛传》中的“择”,孙炎曰“择菜也”,孔疏云“拔菜而择之也”,乃是指清理、去除枯叶、腐叶之意,今普通话读作“zhái”,总之,与英文中“choose”绝非一词。

又如《采芣》,用中文读起来节奏感很强,非常优美: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将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襋之。

① 《十三经注疏》,第2702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② 《十三经注疏》,第13页,中华书局,1980年。

清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一曰：“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若断若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sup>①</sup>余冠英的白话翻译很传神：

车前子儿采呀采，采呀快快采些来。车前子儿采呀采，采呀快快采起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一颗一颗拾起来。车前子儿采呀采，一把一把捋下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手提着衣襟兜起来。车前子儿采呀采，掖起了衣襟兜回来。<sup>②</sup>

用外文怎样翻译才能将这种节奏和美感传达出来，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诸位女士、诸位先生，“五经”的翻译意义重大，重新翻译的空间广阔。这是一件惠及全人类的、功德无量的学术工作。在 21 世纪之初，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有世界各国优秀的学者和翻译家参与，有充足的图书数据，有现代的信息处理手段，有中国国家汉办的大力支持，我们只要营造一种良好的学术气氛，以学者的态度，齐心协力，精益求精，就一定能够将施舟人教授提出的理想付诸实现。

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集世界各国汉学家之力翻译的“五经”能够顺利出版，并且在世界各国赢得读者的喜爱。我们要把那一天当做国际汉学家的节日隆重地庆祝，点起大红灯笼来，举起鲜花和美酒来，共同庆祝学术界这一盛举的成功！

（作者：袁行霈，北京大学教授）

① 方玉润：《诗经原始》，第 85 页，中华书局，1986 年。

② 余冠英：《诗经选译》，第 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

# 谈炎黄研究与二重证据法

◇鲁 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文化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炎帝黄帝及其时代历史文化研究,呈现空前活跃的局面。这与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密不可分。本文试图就此作一些粗浅分析。

## 一、新时期二重证据法在炎黄研究上的运用

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先生倡导的历史研究方法。1925年,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演时说: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sup>①</sup>

简言之,二重证据法是指将“纸上之材料”(古代文献)与“地下之材料”(考古发现)互相印证,以作出判断。这是一种科学的论证方法,早已被史学界所公认。采取这种方法,大大推进了史学的前进。

饶宗颐先生后来又提出“三重证据法”,即将王国维先生所说“地下之材料”分为“无文字的实物”和“有文字的材料”,其中地下无文字的实物为“第二重证据”,地下有文字的材料为“第三重证据”。实际上,这是将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加以细化。还有学者提出“多重证据法”,即在三重证据之外,再加上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的材料,诸如各民族的民间传说、民俗资料、文化遗迹以及古代诗歌等。这些材料对历史研究也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最基本最有力的,还是“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材料”这两种材料的互相印证。三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都是以二重证据法为基础的。

炎黄时代历史文化的研究,以往大多在古代文献上下工夫,这主要由于当时

<sup>①</sup>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考古学文辑》,第25页,凤凰出版社,1988年。

相关考古资料很少。随着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大量增加,二重证据法运用于炎黄研究的基础条件逐步具备。然而,在一段时间里,文献研究与相关考古资料研究的结合似未受到充分重视,学术研讨与论著仍主要依据文献,而考古学者往往对炎黄传说避而不谈。随着炎黄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以来,自觉地在炎黄研究中运用二重证据法的越来越多。许多学者在认真研究古代文献的同时,十分注重相关考古资料的研究,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有些学者还引用相关民间传说、民俗民风、文化遗迹等,作为辅助的论证。

二重证据法的广泛运用,开拓了新时期炎黄研究的新局面;炎黄研究的深入,又反过来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二重证据法的重要价值与运用方法。

## 二、二重证据法在炎黄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与主要特点

为了在炎黄研究中更好地运用二重证据法,有必要对王国维的有关论述作进一步的学习与领会。

上引王国维《古史新证》的一段话,总的是在强调“地下之材料”的重要作用在于可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但这种“补足纠正”作用,因不同情况而有所区别。按他的述说,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依据“地下之新材料”,得以“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也即运用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相对应,能够证明其完全为历史事实的。

二是“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所谓“百家不雅驯之言”,是借用司马迁的提法,大体指那些有关远古时代历史的文献记载,由于当时还没有文字,后人只能根据口耳相传的素材追记并整理出来,其特点是比较零星分散,夹杂着不少神话或带有神话色彩,有许多其说不一、互相抵牾之处,难免有讹传的成分,因而绝非全部可信。司马迁把有关黄帝的传说归于其中。他的《五帝本纪》,是“择其言尤雅者”,即选择那些在他看来比较可信的内容写出的。王国维认为,对“不雅驯之言”的文献记载,依据相关考古资料,虽不能证明其全部可信,但也能证明其含有某些历史事实,而不应一笔抹杀。

三是“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王国维所持这一观点十分重要,是从二重证据法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依据二重证据法,文献所记载的,凡得到考古资料证明的,自然应当加以肯定;而文献所记载的,虽没有考古资料得以证明其为史实,但也没有考古资料得以证明其不是史实的,也不要轻易否定。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全面理解“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材料”相互关系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二重证据法运用于殷商以降的历史研究,已取得许多重大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王国维本人就依据甲骨文和金文这两种“地下之材料”,写出《殷卜辞中

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篇,对《世本》、《史记·殷本纪》、《三代世表》等文献记载有关殷代世系及其人物作了考证,证明属实,认定“东周以上无史”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的。

可是,二重证据法对于商以前的历史研究,尤其是炎黄研究,是否也具有其重要价值呢?这是一个需要作出明确回答的问题。

二重证据法作为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对于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都适用,这是毫无疑义的。但由于二重证据法所依据的“二重证据”——“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材料”,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因此其运用也必然有所区别。这里有一个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普遍性、共性寓于特殊性、个性之中。在炎黄研究中运用二重证据法,与殷商以降历史研究运用二重证据法,既有其共同点,又有其不同点。

炎黄研究不同于殷商以降研究的最大特点和难点,在于时代更为久远,尤其是至今尚未发现当时的文字。尽管已有多处考古发现了刻画符号,甚至若干被认为可能是早期的文字,并有学者经研究后辨认释读。这虽足以证明黄帝命仓颉“始作书”绝非空穴来风,但还不足以对炎黄研究起直接的印证作用。因而,炎黄研究中运用二重证据法,与殷商以降研究中运用二重证据法有重大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有关文献(“纸上之材料”)都不是当时的记载,而是相隔已久的后人追记整理的,有诸多模糊与矛盾之处;另一方面,有关考古资料(“地下之材料”)只有“无文字的实物”,也即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的遗存,而无“有文字的材料”。就其印证作用而言,炎黄时代的相关考古资料,无法与殷商时代载有甲骨文、金文等的考古资料相提并论。因此,二重证据法用于炎黄研究,既要充分肯定其重要作用,又要看到其存在很大的困难与局限。

### 三、二重证据法与炎黄传说的“质素、核心”

近年来,在炎黄研究中,经常引用徐旭生先生的名言:“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sup>①</sup>这话言简意赅,充分肯定了古史传说的价值所在。在此以前,王国维先生也曾说过:“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相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sup>②</sup>其对于远古传说中蕴涵着史实,也说得十分明白。

这两段话很有针对性。当前,对于炎黄传说,一方面,仍然有人将其视为“向壁虚造”的,不屑一顾;另一方面,也有人无视其中“有所缘饰”的部分,全当成信史。如何透过古史传说的重重迷雾,发现其中“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在

①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2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②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考古学文辑》,第25页,凤凰出版社,1988年。